

□ 专题文论

转型与现代化

# 系统理论创新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 中国与苏联比较研究

黄立蓓

【内容提要】社会主义国家运用市场经济机制的实验始于1921年春苏俄实行的新经济政策，但列宁开启的这一伟大创新仅持续了7~8年就被抛弃了；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走上市场经济之路，不断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从系统理论创新这一新视角分析中苏两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命运迥异的原因，看到：由于苏俄为了摆脱战时共产主义产生的经济与政治危机、实施新经济政策转向利用市场经济道路，在理论领域、经济领域、政治社会领域的三个重大基本问题上与马克思主义传统观点产生了矛盾。由于苏联在这三个基本问题上有两个半缺乏新的系统的理论的支持，在市场经济不断深化的形势下，经济领域市场经济机制运行与理论领域、政治社会领域的传统观点产生冲突——出现了“打‘右’灯，向左走”的矛盾。由于市场道路仅在经济领域孤军前进，新经济政策招致夭折的命运。而中国共产党实行市场经济改革以后，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重大基本问题上进行了较系统的理论创新，闯过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上生与死的三道关隘。

【关键词】系统理论创新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中苏比较

【中图分类号】F13/17.5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1094(2012)05-0015-0005

社会主义国家运用市场经济机制的实验始于1921年春苏俄实行的新经济政策，但列宁开启的这一伟大创新仅持续了7~8年就被抛弃了。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逐步走上市场经济之路。虽然此后30多年，中国在这条道路上经历了风风雨雨，但取得的巨大成就举世瞩目。为什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中国能够不断深入、开花结果，却在苏联夭折？国内学术界普遍把新经济政策的终结归咎于斯大林，认为其原因在于斯大林没有把握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将其当作“权宜之计”造成的<sup>①</sup>。本文

不认同这一观点，将从系统理论创新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这一新的视角，对该问题进行探讨。

① 参见陈榕：《“新经济政策”为什么没有坚持下去——斯大林抛弃列宁晚年社会主义理论的原因探讨》，载《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2002年第2期；王世涛、季开胜：《苏联“新经济政策”终结的原因及启示——兼与李述森同志商榷》，载《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靳晓光：《关于列宁新经济政策的两点思考》，载《沈阳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王力军：《新经济政策的终结与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观》，载《东方论坛》2003年第4期；陈克良：《新经济政策的提出、实施和中止》，载《浙江丝绸工学院学报》1996年第2期。

【作者简介】黄立蓓，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 一、三个重大基本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生与死的三道关隘

社会发展的基本领域——经济、政治与社会领域是相互依存紧密联系的，任何一条社会发展道路得以存在和发展，都拥有内在逻辑统一的、特定的理论基础的保障与支持。社会在不断发展，每当其处于十字路口，如果选择了与当下不同的新发展道路，就会与传统道路的理论发生矛盾和冲突，而新道路能否继续下去最重要的前提之一，要看是否形成了各社会领域内在逻辑统一的理论，给新道路以合理的解释。如果有了新的理论基础，在实践中这条道路将有可能得到多个社会领域全方位的支持，继续前进；否则，新、旧理论间存在的矛盾将导致各个领域政策相互冲突，社会发展将退回传统的道路。

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认为社会主义应该消灭私有制，消灭资产阶级，摒弃市场经济道路。苏维埃俄国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依据马克思主义这一基本论断，在十月革命以后实行了生产资料国有化改造，消灭了地主和资产阶级；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摒弃了商品货币关系，走上了符合马克思主义传统理论的社会主义道路。1921年春，列宁为了摆脱战时共产主义产生的经济与政治危机，开始实施新经济政策，转向了利用市场经济的道路。在这种情况下，就有三个重大基本问题与马克思主义传统观点产生了矛盾：第一，在理论方面，搞市场经济是否就是搞资本主义？即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如何？第二，在经济方面，是否允许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仍然等于单一公有制，还是应该构建新的所有制结构？第三，在政治与社会方面，非公经济所有者和管理者在社会主义市场条件下是否仍然简单地等于资产阶级，党暂时利用他们后是否应迅速消灭之。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对马克思主义传统理论的根本突破，如果不对这三个基本问题进行理论创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将无法继续坚持下去。

## 二、两个半问题没有理论创新：苏联新经济政策必然夭折

苏俄实行新经济政策，不能不遇到上述三个问题。1924年列宁在口授的文章中提出“合作社的发展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sup>①</sup>，虽然其中暗含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可以兼容的思想，但遗憾的是，他没有明确提出这一点；与此同时，由于列宁逝世过早，没来得及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有制结构问题上、对非公有

者政治定性以及如何对待他们的问题上提出自己的明确系统的论断。由于在这三个基本问题上有两个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兼容的问题不明确）缺乏新的系统的理论的支持，在市场经济不断深化，上述问题日益凸现和迫切需要解决的情况下，俄共（布）绕不开传统观点，即对市场经济的认识仍然停留在列宁1921年10月17日的观点上：“新经济政策就是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就是在很大程度上转而恢复资本主义。”<sup>②</sup>由于党内绝大多数人从内心深处认为运用市场经济是恢复资本主义的权宜之计，与此相联系，在所有制结构问题、对非公有制所有者政治定性问题上也完全停留在传统认识上，这导致布尔什维克党在一定程度上利用市场经济机制的同时，采取了一系列旨在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政策。在所有制结构问题上，联共（布）于1927年年底提出了消灭城乡国民经济中的资本主义和消灭农村资本主义的方针<sup>③</sup>，在对待非公财产所有者问题上，1926年7月提出“彻底肃清资产阶级分子（耐普曼、富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劳动群众的政治影响的残余”<sup>④</sup>，使私营经济比重、耐普曼的数量和影响迅速下降。与此同时，在其他社会领域也采取了消除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影响的措施：政治领域，实行新经济政策初期，在国家最高管理机构中（由中央直接任命的1号官册干部）非无产阶级的职员出身者曾有近70%，由于党只信任无产者出身的干部，便通过中央高度集权的官册干部制度大规模选拔工人出身的共产党员到重要的领导岗位，到20年代末，在苏联最高管理机构干部中职员出身者降至18%，工农出身的共产党员升至80.9%<sup>⑤</sup>，成为领导干部队伍的绝对主体；在文化教育领域，党通过清洗科学院中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在大学中创建只招收工农出身的工人系，工农子弟和工农出身者逐渐成为知识分子队伍的主流（1925～1926学年全苏高等学校中有40%的学生毕业于工人系<sup>⑥</sup>；新经济政策初期社会组织全部是自愿型组织，党通过重新登记等措施限制自愿社会组织发展，自上而下扶植“协助政权”型的组织，结果，1924～1928年，自愿型组织仅增加了3倍，而“协助

①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3页。

② 同上，第576页。

③ 《斯大林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256页。

④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三分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69页。

⑤ См.:РГАСПИ, ф.17, оп.68, д.462, л.2. Бинеман Я., Хейман С. Кадры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и кооперативного аппарата СССР. М.:Политика, 1930.С.81.

⑥ Шинкарук С.А. Отражение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конъюнктуры в повседневной жизни население России//Российская повседневность,1921-1941 гг, новые подходы. СПб.,1995.С.23.

政权型”组织增加了76倍<sup>①</sup>——成为社会组织绝对主体；在社会舆论方面谴责耐普曼，宣传耐普曼之死的主题也屡见不鲜。总之，新经济政策时期允许一定程度发展“资本主义”，但这只是为恢复经济采取的权宜之计，联共（布）始终在为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做准备。因此，经济领域允许“资本主义”发展是被动的，无奈的，有限的，而在政治领域、社会领域、文化教育、意识形态宣传领域准备彻底消灭资本主义的措施是主动的、积极的，完全彻底的。联共（布）通过消灭资本主义残余和影响的一系列努力，大体准备好了排挤和彻底消灭资本主义的干部队伍<sup>②</sup>、知识分子队伍、社会组织体系，舆论喉舌和舆论氛围。使支持新经济政策的社会力量日渐萎缩，而不理解，不支持，甚至反对新经济政策的力量日益增强。由于市场经济机制只在经济领域一些部门和环节孤立地存在，得不到其他领域的支持，必然遭受夭折的命运。

### 三、全方位理论创新——中国市场经济改革不断前进的动力

1978年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市场经济改革因在三个重大基本理论问题上勇敢创新，得以不断深入发展。

第一个重大问题：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可以兼容。中国市场经济改革得以不断深化，首先是因为解决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关系的问题。16～18世纪中国产生资本主义萌芽，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存在着小农、地主、资产阶级、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阶层。1949年以后，中国仿效苏联，没收了地主的土地，消灭了地主阶级，没收了官僚资产阶级财产，对城市工商业资产阶级实行赎买政策，消灭了资产阶级。在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建立了计划经济模式。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毛泽东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指导下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毛泽东认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只有“以阶级斗争为纲”，“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sup>③</sup>。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大量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甚至提出“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极左口号。文化大革命使中国处于经济崩溃的边缘。1978年，以邓小平为首的

党中央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摒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和开放的路线。1979年3月13日，邓小平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中国实行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sup>④</sup>，这些基本方针的确立，使中国掉转了船头，脱离了左的轨道，走上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与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摒弃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道路。中国同样首先需要解决苏联实行市场经济之后曾遇到的第一个重大基本问题：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关系的问题。邓小平汲取了苏联新经济政策夭折的教训，于1979年11月26日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sup>⑤</sup>，明确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并非水火不容，而是可以兼容的。但由于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这一传统观念根深蒂固，改革步履蹒跚。为了推动改革的步伐，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到南方视察，发表了一系列重要的讲话。他一针见血地点出了害怕搞资本主义是市场经济改革缓慢的要害问题，提出了以“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来判断是否是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sup>⑥</sup>“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提出，确定了以“三个有利于”开道，经由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之路，从而走向“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目标，确定了判断何为社会主义的正确思路 and 标准。以此为基础，在1992年党的十四大决议中，中国共产党理直气壮地提出了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中国闯过了决定市场经济改革生与死的第一个关隘。

第二个重大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有制结构

<sup>①</sup> Власов Ю. Добровольные общества как форма советской демократии // Советское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о. 1929. №4.

<sup>②</sup> 从1919年党的八大到1927年十五大，大会代表受过高等教育者从23.9%降至4.4%，受过中等教育从24.9%降至12.9%；从八大到十四大，受过初等教育者从37.0%升至66.1%，成为领导干部主体。参见РГАСПИ，ф.17，оп.68，д.449，л.66。由于领导干部文化水平低，不了解、不懂得利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因此，布哈林主要以经济方法分析粮食采购危机的原因，并主张继续实行新经济政策应对粮食采购危机的动议在中央委员会遭到否决，也就不足为奇了。

<sup>③</sup>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http://www.gov.cn/test/2005-06/24/content\\_9300.htm](http://www.gov.cn/test/2005-06/24/content_9300.htm)

<sup>④</sup>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4页。

<sup>⑤</sup> 同上，第236页。

<sup>⑥</sup>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2页。

实行以公有制为主、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由于苏俄以及后来的苏联在新经济政策时期没有在所有制结构问题上进行理论创新，联共（布）从社会主义应以单一公有制取代私有制的传统观念出发，将私商发展等同于资本主义发展，对私营经济采取了逐步排挤和彻底消灭的政策，致使蓬勃发展的市场经济改革昙花一现。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要持续发展下去，正确对待私有经济，构建适宜的所有制结构，是必须解决的第二个关键问题。邓小平肯定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可以兼容，并以此为基础，在 1992 年党的十四大决议中，提出了“以公有制为主，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的理论，在所有制结构问题上大胆进行了理论创新，闯过了拦在中国市场改革深入发展道路上的第二个关隘。

第三个重大问题：将非公经济新社会阶层在政治上定性为“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可以吸收其中自觉为党的纲领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的优秀分子入党。实行市场经济以后，由于所有制多元化，必然出现财富不断积累的私有业主，苏联将实行市场经济之后出现的新社会群体（耐普曼）定性为资产阶级分子，对其实施排挤、打击、消灭的政策，此举成为苏联抛弃新经济政策最重要的步骤之一。中国改革开放以后，迅速涌现出一批拥有个人财产的非公所有者和管理者，如何在政治上对待这一新的社会群体，2001 年 2 月 25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提出了“三个代表”的思想<sup>①</sup>。同年 7 月 1 日在中共建党 80 周年讲话和 8 月 31 日“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讲话中，江泽民阐释了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待这一新社会阶层的政治路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而且，许多人在不同所有制、不同行业、不同地域之间流动频繁，人们的职业、身份经常变动。这种变化还会继续下去。”<sup>②</sup>“过去，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军人是最基本的社会阶层，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这些阶层（指新社会阶层——作者注）还会进一步扩大和增强。对这些新的阶层究竟应该怎么看？党在政治上对他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这是不能含糊和回避的重大问题。”<sup>③</sup>江泽民提出了解决这一重大问题正确的基点：“必须适应这种变化，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把广大群众紧紧吸引在党的周围。”<sup>④</sup>同时根据新社会阶层中广大人员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

贡献的事实，对这一新社会阶层进行了政治定性：“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这些新的社会阶层中的广大人员，通过诚实劳动和工作，通过合法经营，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其他事业做出了贡献……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sup>⑤</sup>在对待其政治态度上，指出：“来自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军人、干部的党员是党的队伍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和骨干力量，同时也应该把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的社会其他方面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江泽民坚决摈弃了贫穷等于社会主义，富裕等于资本主义的左的荒谬公式，还鲜明地提出：“实现人民的富裕幸福，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随着经济的发展，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个人的财产也逐渐增加。在这种情况下，不能简单地把有没有财产、有多少财产当作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与落后的标准。”<sup>⑥</sup>“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扩大执政党社会基础的基本点出发，不是将新社会阶层推向异己的资产阶级阵营，而是将其确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允许其中真正拥护党的路线、经受过考验、在政治上表现优秀的人员入党，使这一阶层看到了广阔的政治前途。“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确地解决了党对新社会阶层政治定性和政治态度的问题，闯过了拦在中国市场经济改革道路上的第三个关隘。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为基础，积极完善法制建设，为市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2004 年颁布宪法修正案确定，“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sup>⑦</sup>。根据这一根本法，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于 2007 年 3 月 16 日通过了旨在“维护国家基本经济制度”、“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保护权利人的物权”的《物权法》<sup>⑧</sup>。在为市场经济发展奠定了最重要的法制基础的同时，“2005 年，国务院颁布了针对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鼓励政策，这是第一份以国务院名义颁布的相

① 《江泽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5 页。

② 同上，第 286 页。

③ 同上，第 340 页。

④ 同上，第 342 页。

⑤ 同上，第 286 页。

⑥ 江泽民接着说，“而主要应该看他们的思想政治状况和现实表现，看他们的财产是怎么得来的以及对财产怎么支配和使用，看他们以自己的劳动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作的贡献”。参见《江泽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86～287 页。

⑦ 温晓芸、贾亚莉：《新中国私有财产宪法保护制度的曲折历程》，<http://wenku.baidu.com/view/e8f2493767ec102de2bd89b5.html>

⑧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http://baike.baidu.com/view/15668.htm>

关政策，它明确规定了进一步放宽非公经济的市场准入，在投资核准、融资服务、财税政策、土地使用、对外贸易和经济技术合作等方面，对非公有制企业与其他所有制企业一样，实行同等待遇”。在此政策下，铁路、民航、邮政、军工、石油石化都成为非公资本可以进入的领域，金融、税务等部门也都推出了利好政策，支持非公经济的发展。

由于得到宪法的保障以及政策的支持，中国非公有制经济迅速发展，2006年年底，全国登记注册的私营企业为494.7万户，占全国企业总数的57.4%<sup>①</sup>，到2011年9月底，全国登记注册私营企业已超过900万家<sup>②</sup>。非公经济在推动中国经济融入全球化浪潮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2005年对外直接投资的母体民营企业占全国对外投资企业总数的64%。由民营企业家和非公经济人士组成的“新社会阶层”数量和实力不断壮大，有调查数据表明，截至2007年，我国“新社会阶层”相关从业人员约1.5亿人，掌握或管理着10万亿元左右的资本，使用着全国半数以上的技术专利，直接或间接地贡献着全国近1/3的税收。个体私营工业已占全国工业增加值和销售收入的40%左右；占全国商品销

售总额和零售总额的60%以上，非公有制经济（包括外资经济）占GDP的比重已经超过60%<sup>③</sup>。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新社会阶层中忠于党的事业者被吸收入党；新阶层中优秀者当选为政协委员或人大代表，参政议政。此外，在有规模的非公企业中普遍设立了共产党的组织，中国共产党通过“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时俱进地扩大了执政的群众基础。

总之，中国共产党以大无畏的勇气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对实行市场经济以后出现的三个重大基本问题进行理论创新，闯过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上生与死的三道关隘；以坚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理论为基础，市场经济道路得到政治和社会等各个领域的全面支持，不断向纵深发展。（责任编辑 李淑华）

① 《科学发展 和谐中国：民营经济在中国》，2007年10月9日中国新闻视频，<http://www.cctv.com>

② 《截至2011年9月全国登记注册私营企业超900万家》，[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2-01/11/c\\_111417830.htm](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2-01/11/c_111417830.htm)

③ 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新社会阶层的政治参与》，华文出版社2007年版，第109页。[http://www.hz.zjmj.org/yzdy/201111/t20111117\\_281064.html](http://www.hz.zjmj.org/yzdy/201111/t20111117_281064.html)

## Innovations of Systematic Theory and Roads to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a Comparison Study of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HUANG Lifu

**Abstract:** The experiment of using market economic mechanism by socialist countries started in the spring of 1921 when the Soviet Russia carried out the New Economic Policy. But this great innovation started by Lenin only lasted seven to eight years and was abandoned. In 1978, China undertook economic reform and opening up, moved on the road to market economy and made constantly achievements that attracted worldwide attention. Through analysis of the causes of the different fate of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s socialist economic road in terms of a new perspective of the innovation of systematic theory, we see that, in order to get rid of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rises brought about by War communism, and to implement the New Economy Policy, and to transit to the road of using market economy, the Soviet Russia met with three important basic questions in theoretic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fields that were in contradiction to the traditional views of Marxism. Because two and half of the three basic questions had no support from a new and systematic theory, the operation of market economic mechanism in the economic field conflicted with the traditional views in the theoretical, political and social fields — presenting a contradiction of “making a left turn with a flashing right light” when market economy went deeper. Due to that the market road penetrated alone only in the economic field, the new economic policy of the Soviet Union suffered an aborted fate. But China carried out a more systematic theoretical innovation in the three important basic questions of Marxism after practicing market economic reform and broke through the three barriers on the road to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Key words:** innovation of systematic theory;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comparis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